

【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

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

刘兰英

(长安大学 人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从文化学的视野分析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渗透和影响,并论述毛泽东极力走出传统文化的束缚,而对传统文化扬弃、改造以及创新实践的成功与失误,从而剖析毛泽东与传统文化复杂的、内在的精神联系。

关键词:毛泽东;传统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3)04-0024-07

Mao Zedong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LIU Lan-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6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nfiltration and effec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Mao Zedong. It analyses the complicated and inner spiritual link of Mao Zedong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by explaining that Mao Zedong endeavour to overcome the ti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well as showing the merit and fault for developing the useful and discarding the waste, reforming the old and bringing forth new ideas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Key words: Mao Zedong;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effect

毛泽东是一位历史巨人,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千丝万缕、难以割断的。在传统文化熏陶之下,传统文化中的诸思想流派都不同程度地积淀于毛泽东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并在其思想和实践中表现出来。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彻底的反传统者,毛泽东一生都致力于超越传统文化,走出传统的藩篱,并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但这种超越实在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这应该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深刻地了解,深切地热爱,注定了毛泽东与传统文化之间有一种内在的精神依托的关系,这也注定了毛泽东在超越传统文化过程中,必然要有痛苦和坎坷,超越是毛泽东的主观努力,但一定程度的回归的倾向则是客观的甚至是不自觉的。

一、毛泽东的传统文化渊源

(一)毛泽东的成长历程

毛泽东是中国最后一代受过传统国学系统熏陶的知识分子,从《三字经》到“四书五经”,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在封闭的社会环境下走过了一条相当正规的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历程。

自1902年至1909年,毛泽东在韶山6处私塾先后上了6年学,所读的书主要是儒家的经典,接受的基本上都是旧学的传统教育。

由此可知,在24岁知道马克思之前,毛泽东已经在传统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氛围中,初步形成了一种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的文化心理,从而为他毕生的探索奠定了坚实的传统根基。相比于一般的思想观念,主体内在的文化心态对主体的

收稿日期:2003-03-29

作者简介:刘兰英(1965-),女,陕西大荔人,西安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长安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研究。

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更具有根深蒂固的深刻性和持久性。直到晚年,毛泽东还在不断扩大研读古籍的范围。如他读过的一套线装本二十四史共850册,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点和勾画,重要章节不仅自己读,还批着“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在他的房间里,满柜满架甚至满床都是线装古书。对传统文化如此了解,如此热爱,又长期浸润其间,思想不受其影响是不可思议的。

(二) 湖湘文化的熏陶

所谓湖湘文化是一种历史悠久并对湖南乃至全国产生深远影响的地域文化。湖湘文化实际上是一种集我国传统文化之大成的文化,这在王夫之、魏源、曾国藩、杨昌济等人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毛泽东自1911年春到1918年夏,在长沙求学7年。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又曾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同窗好友一道,多次住进岳麓书院的半学斋,体验书院式的生活,在这些代表人物影响下,从湖湘文化入门,毛泽东几乎涉及了中国古代所有重要学派的文化和思想,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文化启蒙思想,而这些文化和思想又给日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打下了深厚的传统的民族的文化烙印。

(三) 毛泽东对传统文化间接吸收——良师益友的影响

通过相当正规的传统的旧学教育,毛泽东熟读了四书五经,有了相当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通过大量阅读史书及杂书,毛泽东则进一步了解了中国传统文化,而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更深刻地了解、理解、领会则得益于其良师益友的熏陶,其中最主要,给予毛泽东思想和人格影响最大的应首推其恩师和岳父杨昌济。

毛泽东不仅从杨昌济那里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由于杨昌济一生极力推崇王船山、顾炎武、谭嗣同和曾国藩,而这些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的思想通过杨昌济又深深地积淀于毛泽东的思想之中,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行为产生至为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有深厚传统文化背景的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李大钊等人对毛泽东早期思想和人格也有广泛影响。

二、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

(一) 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

“内圣外王”是儒家整个思想体系中最核心的思想理念。“内圣”即指人内在的涵养和操守,对人伦关系和准则的领悟与把握;“外王”即是把主体修

养所得推之于社会,将学问引向事业之途,达到与社会风同道一。儒家的“三纲八目”是内圣外王的展开和具体化,而“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实现它的途径和方式,由此形成一套严密的伦理哲学体系,其精神实质是高度推崇道德人格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呈现,以及社会王道秩序的维系的决定性意义。

1. 毛泽东的内圣之道

离开韶山冲后,毛泽东便积极思考和探讨儒家“内圣外王”之道,在老师杨昌济学识与人格的启迪和影响下,毛泽东自然地承继了一整套典型的“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对“内圣”之功的追求,贯穿于毛泽东的整个思想历程。

首先,和杨昌济一样,毛泽东把“内圣”和“外王”的统一,学问和事功的结合视为完美人格的体现。在涉及“内圣”和“外王”的关系时,毛泽东则十分重视前者的前导和决定作用,从而开始自觉地把自我道德人格之完善,视为实践自己远大抱负的必由之路。其次,青年毛泽东认为,“内圣”的完成,在于宇宙的“大本大源”,即“宇宙真理”,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圣贤的基本人格和本质力量之所在,也是能否成就“外王”之业的前提和关键。第三,毛泽东注重内圣功夫,不仅是一种学理的思考,更是一种现实的人生实践,毛泽东几乎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真诚而刻意地厉行圣贤之道,而且已达相当自觉的程度。

2. “内圣外王”的伟大实践

五四以后,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立场上,毛泽东放弃了“唯我论”的哲学观念,以及单纯依靠个体主观上的道德内省功夫来提升人格境界的思想路径,重新以“小我”服务于民族国家的“大我”为价值坐标,建构起一种崭新的“内圣之学”,提出了一个“精神之个人主义”的命题,此学说突出地强调了社会个体必须积极地投身于现实的社会斗争实践,并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改造自己,不断净化自己的思想灵魂,最终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无私、忘我的“纯粹的人”,即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社会主义新人。

按照儒家的思想传统,“内圣”不仅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本,而且也是其“外王”事功的根本所在。非内圣者无术以救天下,救天下者非内圣功夫已臻完美的圣人莫属。这种圣人,在毛泽东看来就是范仲淹、曾国藩一流的人物。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青年毛泽东义无反顾地选择从改造国民思想入手来改造社会,由此毛泽东对思想革命威力的信仰几达狂热

的地步。到晚年,毛泽东最为担忧的不是经济不能腾飞,而是人的思想变修,是“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可能性。从而,重塑中国人的思想灵魂,试图从思想文化,从人的精神世界的提升中找到一条超越资本主义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捷径就成为毛泽东的伟大实践,其目的是要达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社会。因此,可以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绝后的“内圣而外王”,由“动天下心而动天下”的社会大试验。而这种思维方式的结果必然是德治或人治,必然是尽废“政治法律宗教礼仪”,必然是夸大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晚年毛泽东一再强调的“思想革命”、“文化革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毋宁说是一个伦理学概念。毛泽东晚年的政治实践弥漫着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蕴含着丰富的伦理学内涵,这应该是中国传统的伦理政治不自觉的影响。

儒家“内圣外王”思想模式的最高人格理想是德业俱全,“功、德、言”三不朽的圣人,而毛泽东以自己的人生实践,塑造了一种典型的内圣而外王、传教兼办事的人格,毛泽东晚年曾说过,他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正好说明了毛泽东对儒家圣贤人格的终生追求。

(二)毛泽东的民主政治思想与民本主义的价值立场

民本主义的政治理念在中国源远流长,它是儒家最核心的价值理念之一。青年毛泽东曾相当真诚地信奉过儒家传统的民本主义政治哲学。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信念,几乎伴随了毛泽东的一生,它相当深刻地体现出“天人合一”,天道人道同是一道的精神传统。毛泽东日后一再强调的群众路线,与这种传统的民本王道观念在精神上是完全相通的。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开始由传统民本主义向近代意义的民主主义转换。

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毛泽东的政治哲学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也更具有了系统性和实践性。其一,政治理论与历史哲学的高度统一。同“人民就是上帝”的政治信念相一致,毛泽东在社会历史观上也牢固地确立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其二,政治主体与权力本源的统一。建国后,毛泽东已不再是一般性地肯定人民群众的政治主体地位,而且进一步强调了人民群众是一切权力的源泉。其三,在政治价值观和道德观上,毛泽东形成并反复强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全新的价值观。

毛泽东不仅长期致力于建构一种彻底的系统的民主政治理论,而且执著于实践其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虽然毛泽东的民主政治思想几经变化,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未能割断同传统民本思想的精神联系,尤其在晚年,毛泽东由于对官僚制管理体制的不满,从而引发对政治制度化的一种不信任感,因此,不知不觉中,毛泽东又按照民本主义的运作思路,为民做主,扮演起“平民天子”的角色。另一方面,建国后毛泽东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基本上是一种哲学层面的思考,从而将注意力集中在“主权在民”、“人民是上帝”之类的抽象性原则上,而忽视了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建设,这与传统民本思想仅是作为一种价值理想,一种道德精神有惊人相通之处,文化上的承继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三)实践理性——务实作风

1. 实践理性

实践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最本质的规定之一,主要体现为一种重现世、重实践、重事实、重功效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其基本特征表现为思想主体不是执迷于抽象的理论思辩,而是执著于人间世道的实用探求,执著于现实的社会实践,要求将一切社会事物放置到现实实践的天平上,以实用理性为圭臬进行价值评判和褒贬取舍。其理论形态呈现于儒、道、法、墨诸学之中,而孔子、孟子、荀子都是力行主义者。明末清初早期启蒙思想家继承了重行、力行的儒学传统,在反对道学唯心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经世致用的实学风潮。实学风潮在湖南则突出地表现为“湘学士风”。在湘学士风的熏陶下,在具有实学遗风的杨昌济和徐特立的影响下,深得颜习斋学问之精髓,出身农家的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思想性格就表现出相当鲜明的现实性、实践性、功利性的务实作风,实践理性精神构成其毕生思想性格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2. 毛泽东的务实之风

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从既有的理论教条和经验框框以及人的主观意愿出发,这是毛泽东之所以比同时代人更能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并在中国革命处于困境之际,独辟蹊径,成功地开拓出一条中国式革命道路的重要个性依据,也是毛泽东创造其毕生成功业绩不可缺少的精神要素。

尽管毛泽东是一位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憧憬的思想家,但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表现出浓郁的实践理性精神,以务实的态度来制定和选择现实斗争的策略。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到“实

事求是”为灵魂的思想体系的确立,从《反对本本主义》到《改造我们的学习》,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到“战术上重视敌人”,现实性成了毛泽东实现其远大的理想抱负的理性支撑。

毛泽东一生都偏好哲学,好探讨宇宙、社会、人生的“大本大源”,但他却从未沉溺于纯理论的抽象思辩,而是特别看重实践,他所热衷的理论是能直接服务于现实斗争实践的理论。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实践过“工读互助”的理想,也正因为如此,在当时流行的众多主义、思潮中,他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无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1]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在其哲学思想体系中,之所以把“实践”提到认识论乃至整个哲学之第一的位置上,不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性格,而且也深刻地反映出其哲学思想中所具有的传统实践理性精神的文化背景。

现实性、实践性的思想性格,很自然地派生出实用性、功利性的价值取向。一个政治家以功利的眼光来看待一切,这本身可以理解。但如果将这种功利主义推向极端,就可能导致思想扭曲。

(四) 农家文化

农家文化的长期熏陶,以及由此建立的与农家文化的紧密联系,是塑造毛泽东文化性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背景之一。农家生活环境潜移默化的作用以及思想情感上同农民的息息相通,水乳交融,不仅给毛泽东毕生的思想性格打上了鲜明的农家烙印,而且使毛泽东在中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度里从事革命实践显得比别人更为得心应手,也更为成功。

1. 农家环境

毛泽东出生在湖南湘潭县的一个偏僻山村的普通农民家庭,16岁之前,毛泽东接触到的唯一的生活环境就是农家生活,而无处不在的农家文化则给他整个的文化心态、以及外在气质打上难以磨灭的烙印。

2. 价值情感

农家文化对毛泽东的深刻影响,最主要的与其说是外在气质和生活习性,毋宁说是内在的思想性格。农家文化深刻地积淀在毛泽东的价值理想、思维模式、实践性格等各个层面,是他一生最重要的文化精神背景之一。这对毛泽东整个文化心态的塑造和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也使毛泽东改造中国

的实践打上了农家文化深深的烙印。

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在读《水浒》之类的小说故事时,发现故事里的主人公没有一个是种地的农民,并对此表示出极大的不满时,毛泽东已将自己的价值情感倾注于农民身上。而毛泽东一生的最大成功,就在于他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贫苦农民的心理具有非常细致入微的洞察了解,并在此基础上对他们最迫切的愿望作了集中的表达。毛泽东对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体,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突出强调不仅是理论上的理性认识,而且出于价值情感上的共鸣。理性认识和价值情感的相互交融,使毛泽东成了农民历史地位、社会作用以及政治权利最忠实的辩护人。也正因为如此,出身农家的毛泽东才能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到中国。但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毫无疑问必须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全面改造农民的小生产者意识。情感上对农家文化深深的依恋,政治立场上对农民的同情和肯定,往往使他淡忘了农民文化的历史局限性,因而要真正完成对农民文化的超越和扬弃,对毛泽东而言是非常困难的。

3. 两难抉择

近代社会文化剧烈冲突中,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冲突给近代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困扰。毛泽东毕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在文化上的选择也必然是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必然是对农村的重视,对于农家文化的偏爱。

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毛泽东就曾热情地赞扬了乡村生活的优越性,并从新村建设入手,勾画了一个庞大的乌托邦蓝图,著名的《学生之工作》一文就是其新村计划书的一章。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并未从思想上彻底深刻地清算这种思想,因而这种思想仍忽隐忽现于毛泽东以后的社会实践之中。如将农民的政治要求神圣化,将农民的道德人格高尚化,将农民的智慧理想化(“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等。

建国后,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再次进入封闭状态,与这一社会状态相适应的农家文化,民粹主义也就自然抬头,并向社会各方面渗透,在社会实践中再现。其具体表现为:

(1)毛泽东将自己的注意力又重新转向了农村,并把农村作为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及其种种弊病,极力开创一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捷径的实验场。

(2)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毛泽东变得越

来越不信任专家、技术以及现代教育的作用,转而期望人民群众的道德热情成为促进经济飞跃的精神原子弹。这种反智主义倾向早在五四时期流行的“劳工神圣”思潮中就已经出现。这种文化现象也决不只是哪个人的思想误区问题,而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现象。

(3)在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上,晚年毛泽东在猛烈抨击知识分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腐朽性和知识分子无知性的同时,却一再颂扬农民老粗世界观的纯洁性,以及知识与智慧的无比丰富性,并以此作为其抵御西方民主主义文明侵蚀,防止中国受到修正主义感染的最后思想武器,不仅各级干部必须进“五·七”干校,青年知识分子必须上山下乡,甚至一度连工人阶级也下放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4)晚年毛泽东的某些思想意识还流露出一种反城市文明的倾向。

毛泽东是中国传统文化塑造出来的历史巨人,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远不止我们列举的那些方面,而是更为丰富、更为深刻。毛泽东人格世界的每一个侧面的精神特色,都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精神底蕴。反过来,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子百家的思想学说都可以在毛泽东的人格世界中寻觅到它所留下的思想痕迹。因此,就毛泽东的文化心态和人格气质而言,民族文化的精神传统对他的影响相比于西方文化而言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毛泽东的整个人格世界,自始至终都深深地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之中。从价值理想、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生存风格到人格信念,毛泽东身上始终保留着一条维系其心灵世界与民族文化传统之联系的精神脐带。没有毛泽东,我们无法想象今天中国的文化会是什么样的局面;而离开中国传统文化,我们更是根本无法想象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会诞生这样一位神奇而独特的毛泽东。

三、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扬弃

(一)否定与超越

毛泽东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毛泽东不仅接受了全部的正规的“四书五经”式的儒家教育,而且吸收了非主流、非正统的农家文化、墨家文化,甚至道家文化的精华,从而奠定了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而这种传统文化功底又为毛泽东思想理论打下了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根基。

年轻时的毛泽东曾是孔子的崇拜者。到五四运动时期,在严峻的救亡危机面前,毛泽东毫不动摇地将目光转向了西方,希望从西方找到足以拯救民族危机,促使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本大源”。他以近代西方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个性至上、自我实现等思想观念为价值背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腐朽内容展开了猛烈的批判。随后,在众多的西方理论和主义之中,毛泽东顺应时代潮流,最终选定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终身信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实现自己“改造中国与世界”崇高理想以及自我安心立命的精神依托。这一切就从根本上铸就了毛泽东毕生反传统的文化性格,铸就了他矢志走出传统文化的樊篱的心路历程。

毛泽东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就标志着否定和超越了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否定是选择的前提,不否定旧的传统文化,就不可能选择新的马克思主义文化。

(二)批判和继承

毛泽东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总方针、总态度是:“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认为“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2]

毛泽东关于传统文化的基本看法,散见于毛泽东的许多文章之中,他在这方面论述很多。其基本主张便是:批判继承,古为今用。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性地位之后,马克思主义取代儒家文化成为他的思想权威。但是,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全部抛弃自己过去所接受的传统文化。从文化层面上讲,毛泽东一生最大的成功,就在于他在中西方文化的冲突面前没有走向非此即彼的极端,而是卓有成效地实现了中西文化的超越性融合。毛泽东创造性地将近代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即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他充分挖掘和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成果,并以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符号通俗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成功地转化为中国人民从事自己解放事业的思想武器,转化为中国人民改造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信仰。这种独特的解释模式,打破了中国人对西洋文化的隔膜心理,使马克思主义顺利地融化成为民族

文化新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借助于毛泽东思想这一中介,来自异域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演化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信仰系统。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全面地、批判性地总结了中国文化历史传统,并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大力发掘和弘扬传统的非主流文化,在五卅新文化解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重构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从而在理论形态上,为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嬗变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

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中丰富的优秀思想精华,为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多方面的宝贵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基础之一。毛泽东思想的文化渊源,既有马克思主义这条主线,又有中国传统文化这条副线。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进行革命的改造和批判地继承,这方面的内容在毛泽东思想中是相当丰富的(比如军事、哲学等)。

(三) 改造与创新

我们一般认为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一种运用、发展和创新,这自然没有错;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运用和创新,是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改造了中国传统文化,改造的过程就是创新的过程。

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其社会属性来说,既非资本主义的,又非社会主义的。在文化属性上,也不好说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因为,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灵魂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也即是资本主义文化孕育出来的,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和发展的毛泽东思想,则又是中国化的结果。所谓“中国化”,也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简单复归。而是一种跳出东西方窠臼的文化独创。毛泽东对此深以为骄傲。

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的创新总是与先进文化建设紧密相关的,其成果具体表现为:

第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灵魂;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而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文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个政治命题,也是一个思想路线和哲学上的世界观的命题。当然,它还是一个文化命题,正是在围绕这一命题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中,形成了中国先进分子自己观察和解决

中国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制定出来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而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来整合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和成分,从而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并最终建构起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的思想文化体系。

第二,通过牢牢地树立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改变了中国传统“早已有之”的文化思维方式和“托古改制”的文化变迁模式。

第三,倡导并确立了先进文化建设的实践性品格,传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实践理性精神。

第四,毛泽东一生追求文化的大众化品格,否定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等级制关系,打破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即拆除了雅与俗、上层与下层,尊与卑之间的樊篱。

(四) 局限与意义

走出传统文化的藩篱,创造新型文化,是毛泽东文化思路的基本脉向。但作为与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农民在价值情感上具有强烈共鸣,而又一心致力于最广泛地动员农民的政治家、革命家,要真正完成对传统文化的超越和扬弃,无疑要比与资本主义文化有较为深刻的联系的近现代知识分子困难得多。这一局限使毛泽东的文化思路充满曲折。一个以超越传统为精神使命的文化先行者,最终受缚于传统而不自觉,这正是毛泽东的文化悲剧所在。

毛泽东提出了对于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原则,并且在认识上始终没有退回去过。但是,在对待“已有的”的文化形态上,他本人的选择和政策推行之间却有着明显的落差。毛泽东一生都比较注重对中国传统智慧的汲取和发挥,即使在倡导与传统“决裂”的晚年,他也孜孜不倦地阅读古籍,并在决策中经常借用一些传统术语和概念进行思维和表达。可在整个社会的文化实践中,他倡导的更多的却是批判多于利用。他过于担心中国传统文化意识对中国施加不利影响,因此就试图在同传统文化的“决裂”中建立全新的、更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发展为“文化大革命”中的那种“横扫封、资、修”的“反文化”运动。

许多人把毛泽东的文化价值取向定位在全盘反传统上。的确,毛泽东不仅在言辞上而且在思想观念上都有许多反传统的表现,在晚年,这种反传统意识甚至是非常激烈的。但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事实并非如此,毛泽东终其一生都绝

难冠之以全盘反传统的称号。其一,晚年毛泽东诚然掀起过一场反儒的思想政治运动,但他在批儒的同时又崇法,并以秦始皇加马克思作为自己的人格注脚。法家、秦始皇同样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二,晚年毛泽东批儒时,同样流露出相当浓厚的传统观念意识,他不仅神往于“兼相爱”、“交相利”的墨家大同理想,而且津津乐道于张鲁式的所谓“社会主义作风”。其反传统的思想实质不过是以传统反传统,即以墨反儒,以褒扬墨学思想以及社会底层的反主流文化,贬低儒家正统思想来实现传统的重建,完成对民族文化传统内部正统文化与反正统文化在地位上的根本置换,建立起以墨家文化、“老粗”文化、受压迫者文化为主流的与其理想的政治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文化秩序。其三,严格地讲,即便是对于儒家正统文化,晚年毛泽东的反传统也仅仅停留在显意识层次,就潜意识层次的思想和文化心态而言,那根深蒂固的“内圣外王”的思维模式,那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恰恰表明了毛泽东在相当程度上对传统文化复归的倾向。

因此,从总体上看,在理性上、主观上,毛泽东是反传统的,但在感情上、客观上,却不自觉地回归传统,尤其在晚年,毛泽东的人格悲剧就在于传统文化性格的日益凸显、膨胀,最终导致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与实践出现重大偏差。

应当指出,正因为毛泽东的人格世界乃是现代

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人格凝聚,毛泽东的文化思路历程乃是两大文化交融的漫长历程的缩影,它深刻地昭示了一个民族要在两种文化的冲突面前,在创造性实现两种文化的有机融合的基础上,建构出一种崭新的文化体系决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经历几代人的长期探索。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结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正如斯图尔特·施拉姆所说的:“在毛生长成人的传统中国和一个竭力要在20世纪下半个世纪吸收最先进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在知识和组织上的需要之间的鸿沟,要由单独一个人来逾越是太艰巨了。”^[3]

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内在的、深刻的、丰富的;毛泽东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和超越也是一贯的,其中的冲突与矛盾,在某种意义上是近现代中国曲折发展历程和民族文化心态变迁的缩影,是中西方文化交融、冲突的必然产物。他不仅代表了一个人,而且代表了一代人,甚至一个民族对待传统文化的复杂情感和无奈选择,其贡献遗惠于今天,其失误也警醒于当世。

参考文献:

- [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施拉姆.毛泽东[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杨彬智]

(上接第19页)

会主义”的问题,本身就包含着要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探讨,因为无产阶级领导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性规定,直接关系到“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的解决;而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弄清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因为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关键性的影响。因此,前一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取决于后一问题解决。

其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实践意义。“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80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实践证明,我党之所以能够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所以能够领导社会主义改造顺利进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关键在于这三个阶段我党能够比较好的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我党之所以出现

发展道路上的曲折,就是偏离了“三个代表”要求。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检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标准,是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总方向,为新世纪党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 邓小平文选(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重要文件选编[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 江泽民.论三个代表[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72.
- [6] 李永清.邓小平理论发展与研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 杨彬智]